



望乡

○ 杨健

基因序列是空间结构，基因表达则与时间有关。小时候，我们实在不明白苦瓜有什么好吃的，也难以理解枯坐一整天一条鱼都钓不到究竟有什么乐趣，更无法体会“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含义。等到觉得苦瓜好吃了，独钓一江秋有趣了，为少年时的叛逆懊悔了，我们也就到了当年父辈的年龄。

望乡，也要经历这样一个“基因开关”从“off”到“on”的过程。

如果把“乡”理解为故乡，我们初尝个中滋味，一般要到成年；而如果把“乡”理解为乡村，那么“望”它的年纪也许要更大些。耐人寻味的是，在现代中国，这种转换只花了短短30年。对于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的国家来讲，这是不寻常的。

从知青回城的狂飙，到农民工迁徙的洪流，城镇化的浪潮始终是近30年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。进城！进城！就像我为亲睹亚运会和建国40周年大庆，高考志愿从一本到大专一水儿填的都是“北京”一样，几乎所有人都向往都市，认为那里才有真正的“文明”和“现代”。

逆转发生在不经意之间。

仿佛是突如其来，沿海闹“民工荒”了，温州农村的户口比城里更吃香了，13亿国民人均有5平方米小产权房了。城镇化率刚过50%，一股望乡的潮流开始拍打中国农村的土地。

因为父母职业的关系，我打小在农村生活过多年。上过两个年级一个班、老师相亲就全班放假的小学，跟房东一家一日三餐吃红薯吃到过反胃，体验过夏天光脚板、冬天拎手炉、晚自习自带煤油灯的生活，农村之苦，可谓感同身受、刻骨铭心。

由于自己职业的缘故，这些年对农村也不陌生。在天堂一样的稻城、亚丁、香格里拉，如画的风景背面，昏暗的酥油灯下，很多人的生活跟十年二十年前差别不大。在舞阳河畔的贵州镇远，一个村子里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打工去了，村支书早已年过花甲，却找不到可以托付的接班人。在有实力借钱给临近县市发工资的国家级贫困县湖南新化，一个村长的非自然死亡被包装成“为民请命惨遭报复”，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，尽管调查显示，其实此人堪

称恶霸，欠下村中留守妇女累累孽债，调查结果却迟迟不敢公布，因为政府担心被问责——“这样的坏人何以长期横行乡里”？而在江苏昆山，在成都东郊，一些农民的日子过得比发达国家公民还要惬意。

30年，首先从乡村亮剑的改革像一把锋利的刻刀，重塑了这个国家，也重塑了乡村自己。原本“落后面前人平等”的格局，迅速被“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”打破。这边是繁华的城镇化，那边是凋敝的空心化；这边是生态修复鸟兽归来，那边是环境恶化鱼虾死绝；这边是强拆上楼，那边是华西金塔；这边是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，那边是沃土撂荒年轻人已忘记如何种地。对于这个90%以上的国民三代以前都是农民的国家，下一个30年，它的农村到底会是什么模样？

在我看来，至少有三个问题是躲不开绕不过的：土地所有权会如何流转？村民自治该怎样发展？农业经营方式将怎样改变？无论是成都的城乡统筹，重庆的土地交易，还是乌坎的村民选举，都仅是刚刚试水。在你我的有生之年，中国最大的变化恐怕还是在农村。对于这一点，政府官员、知识精英和未来面临择业的高校学生，都应及早看到。早一步海阔天空，迟一步悔之晚矣。

十多年前的一个晌午，两个农民怯生生地敲响我的房门。他们是来告状的，因为他们村的村长以建小康村修路为由，征用了大片土地，结果这些地没有修路，而是作为宅基地卖给村民，收入被村委会据为己有。

我像一个地下党员一样悄悄进村，但很快被当地政府发现了踪迹。因为有人去县上报信，说村里来了一个比县长还白还胖的干部，估计跟地委书记平级。宣传部的人火速拍马赶到，几经劝解不成，承诺一定处理村长，给党和群众一个满意的答复。

村长撤了，道路修了，宅基地款清退了，我很有为民除害的满足。两年之后，敲门声再次响起，还是那个村的村民，说上次来找你的村民之一当了村长，结果比原来的村长还坏，您能不能再去我们村一趟？

历史的轮回感，在中国乡村，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深厚。如何打破这循环往复，为你我的故土找一条新路？望乡，是希望，不是观望。❶